

第一编

休闲理论

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

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

自由时间：人是自由的吗

——兼及消费主义批判

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

——休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

闲暇时间：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①

马克思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曾在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内做出了贡献。但是有关他的休闲思想在中国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本中，他从始至终都把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连在一起。因此，他被西方社会评为对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对马克思休闲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旨在帮助我们加深对休闲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并从本质上揭示休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产生的影响。

一、马克思眼中的休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著作的英文版中，休闲一词为 Free-Time，（马克思在其德文版的著作中以及后来译成俄文时使用的是哪个词，未做考证）在中国的译著中通常译为“自由时间”；而西方休闲学研究者通常将 Free-Time 等同于“休闲”（Leisure），但在概念的外延方面略有不同。这个结论可以从我们翻译的《休闲研究译丛》的5本书中得到印证。笔者在访问美国期间就此请教了多位学者，获得了相同的考证和结论。

在马克思眼中：“休闲”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休闲”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自我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走向自由之境界的“物质”保障，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追求目标。人

^① 本文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陆彦明合作完成，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

类想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赢得休闲时间。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彼岸世界只有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在彼岸世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拉开了自由王国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6 页）。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25 页）。归根结底，“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120 页）“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于光远先生在引用这段话时特意强调：“马克思把‘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归入与闲暇时间并列的自由时间的范围，值得注意（于光远：《经济学札记》第 117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写到：“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6 卷，第 1 分册，第 312 页）。可见马克思确实把自由时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另一种是从事普通活动的闲暇时间。休闲既包括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较高级活动，也包括消极、被动的一些消遣活动。但休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种活动中。

二、“休闲”是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

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7 卷第 216 页）。在这个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这样的描绘，“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建立“自由个性”。接着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可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1894 年 1 月 3 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朱·卡内帕请求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世纪》周刊题词，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同年 1 月 9 日写的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句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恩格斯认为这句话最适合用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

在马克思后的 100 多年间，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休闲理念。瑞典著名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美国学者凯利则说：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杰弗瑞·戈比说，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尽管西方学术传统主要来自古希腊，但休闲学的思想渊源却在更大程度上来自马克思。我们可以从西方休闲学学者们的著作中看到对马克思休闲思想的引证和评价，并认为马克思是休闲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循着马克思休闲理论的思想轨迹，西方学者提出休闲的价值更在于：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因为，自工业社会以来，所有衡量人类进步的主客观标准，都是把物质文明作为人类进步的

尺度。但这些标准并不能衡量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也不能衡量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实现自我。同时，这些标准也不能反映出人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正是在休闲这个人们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领域内，人生的意义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

西方休闲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解释休闲的价值目标，也正是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衡量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写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7~38 页）。讲到未来理想社会时，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0 页）。可以说休闲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的价值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马克思对人类生存真正目标的回答。因此，他在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时候把“休闲”作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来对待。也由此可见，休闲对认识人的本质所具有的重要性。

三、缩短工作日、增加自由时间，是建立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自由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只有当生产力很发达，人类才能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游离出相当数量的剩余时间，构成社会的自由时间。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工作日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增加；另一方面，劳动本身的性质的变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

供了另一个广阔的空间。

首先，自由时间是使每个人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发展自由个性的保证。马克思说：“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18~219 页）。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写到：“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体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78~479 页）。

其次，自由时间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提出他的自由王国理论的时候，明确指出，工作日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增加，是建立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他在《资本论》中写到：“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

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在这里“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和‘彼岸’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马克思把人的能力的发展当作“目的本身”，当作自由王国的基本内涵的论述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首先是个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07 页）；“惟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第 154 页）。

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个人生产力，是增加自由时间的根本途径。在马克思那里，发展生产力主要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是以社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其途径主要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管理，完善劳动方式；二是以人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即把重心放在个人能力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上。马克思认为这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决定意义的根本途径。他写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22 页）。他在另一个地方写到：“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第 124 页）。离开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发展生产力就失去意义。

马克思以其深邃的思想，洞察到科学技术发展将给劳动性质和人的发展带来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洞察到个人一般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中作

用的凸显：“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 总之 是社会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22 页）。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见到了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这是对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真正洞见。

四、马克思说：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

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社会生产总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环节，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他认为，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以各种方式消费着，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之前还是生产期间。为此他举例说：“一条铁路 如果没有通车 不被磨损、不被消费 它只能是可能性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实现它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住，事实上就不能成其为现实的房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第 94 页）。在他看来，本来作为人的自我生活过程的消费，在市场体制生产方式中却被当作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对对等的概念，这是只有在市场体制的生产方式和市场体制的消费方式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消费本来是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过程，而生产则仅为对此目的而进行。把二者作为一对对等概念，只不过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才成立的。

马克思还认为，消费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个目的是对人来说的，是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来说的。当然，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目的的表现形式不同。他曾经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在第一大社会形态即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486 页）。这是以人本身为生产目的的经济。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即商品经济居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同上书 第 486 页）。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在第三大社会形态中，自由个性的发展成为目的。这种发展的基础是个人的全

面发展，并且，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同上书，第 486 页）。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这是真正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25~226 页）。在这个基础上看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应该得出这个结论：“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正因为如此，他高度评价具有广泛需要的人为“完整的人和全面的人”，把具有多种享受能力视作有高度文明的人的一个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深刻阐释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时，对消费主义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9 世纪中叶，随着近代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准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望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试图以物欲的满足和占有来构筑其心理和精神的需求，把人的价值单一地定位于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仅仅供享乐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41~142 页）。因而，人们也就不由自主地把人的自由纳入到了“消费”的制度体系当中，自由不再是需要精神付出的艰难行程。进而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4 页）。

五、马克思休闲思想在当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50年前，马克思的战友彼·拉·拉甫洛夫曾预言：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恩格斯引用并同意彼·拉·拉甫洛夫的见解，并接着写下了这段话：“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我们说的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150年后，西方未来学家也做出这样的预测：到2015年“可以让人们把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将逐渐演变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内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预见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今天，他的预言正在得到验证。

虽然，中国距休闲时代还有一段遥远的路，但不能不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们就实现了发达国家经过100多年奋斗才拥有的“自由时间”的量，表明中国正进入休闲在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这标志着人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人从满足现实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标志着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已由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逐渐地转向消费——生产的模式；标志着人开始从有限地发展转向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新阶段。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统一问题，他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七一”讲话单行本第42~43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

多，人民的生活就越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同上第 44 页）。这是对马克思休闲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深刻认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问题、“人的本质”的问题、“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问题、“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南。

因此，系统地考察马克思休闲思想以指导我们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理当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

参 考 文 献

1. 约翰·凯利著，赵冉译：《走向自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2. 托马斯·古德爾等著，成素梅等译：《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3. 杰弗瑞·戈比著，田松等译：《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4. 卡拉·亨德森等著，刘耳等译：《女性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5. 马惠娣、成素梅：《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期。
6. 马惠娣：《21世纪的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期。
7. 马惠娣、刘耳：《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
8. 马惠娣：《休闲——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①

自由时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走向自由之境界的“物质”保障。马克思特别关注“自由时间”的研究，曾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的自由时间不断地增加，人类的精神自由有了更广阔的时空。然而，人在现代化所创造的极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不断地张开愈加贪婪的大口，我们这个时代几尽被消费主义侵蚀。

一、关于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

人的生命活动主要由两部分时间组成：即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传统意义的劳动时间是指人为谋生而付出的劳动和生命代价。自由时间是指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可供个人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客观地讲，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效率的提高、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增多具有正相关性。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自由时间的充裕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自由时间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新的尺度。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早期的劳动时间内的活动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缺乏丰富内涵和创造动力的一种物质报酬性活动；相比之下，自由时间内的活动包含有增长人的道德、智性，寻找人生志趣和活力，精神生活得到满足的自由支配性活动。所以没有自由时间，就不会有一切科学、艺术、诗歌等富有创造性，融智慧及浪漫于一体的社会文明。

然而，在历史上，相对于原始狩猎、传统耕种的自然经济形态而言，自由时间的出现并非所有劳动者可以享受，它一方面奠定了私有制社会发

^① 此文与山西大学成素梅教授合作，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1期。

展的基础，使物质的占有与权力、地位及荣耀联系在一起，成为少数有闲阶层的一种特权享受；另一方面把物质占有多少作为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从而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对立起来，使劳动者得不到原有意义上的体能恢复和精神慰藉。

工业文明兴起之后，自由时间不再被有闲阶层所垄断，劳动者由生产过程的主体承担者，转变为机器的管理者或操作者。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快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使劳动时间比过去缩减了一半之多，不断增多的自由时间便成为大众共享的集体财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资本家在极大地占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必须同培养和造就具有多方面享受能力的社会人，使广大的劳动者成为丰富的工业产品的消费者。当生产者把生产的目标主要投向刺激消费的层面的时候，生产必须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时，自由时间也就不成为劳动时间的对立面了，消费便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增长点。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225页）。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将把培育和完美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变成是以资本为基础生产的一个条件。自由时间与财富联系起来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对自由时间具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趋向。

其一，相对于一切抱有商用目的的社会活动而言，自由时间成为消费社会崛起的主要前提，一方面借助各种新闻媒体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者抓住人们固有的物质贪欲来培育人们对物质的无止境的追求。商品广告固然不是商品本身，但是却在宣传消费主义；另一方面，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的无节制追求，极大地亵渎了人的真正本性，给自由时间蒙上了病态、庸俗、奢侈浪费的“面纱”，使人远离了人类自身朴实、博爱的内

在美德，在无意识中走入误区，甚至潜在地策划着毁灭人类精神家园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人生悲剧。

其二，相对于一切超越商用目的，追求以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最终达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活动而言，自由时间的充裕，具有了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有利于创造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使人们的劳动最终由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转变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劳动意义的革命性变化；其次，它有助于消灭旧式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不公平，缩小劳动操作方式的差别、劳动部门的差别以及劳动产品的差别；再次，它有利于把人的劳动与志趣结合起来、劳动与教育协调起来。毫无疑问，自由自觉的劳动可以促进人的创造性的发挥，驱走了人的约束性心理，排除了异化劳动对人的形式上的限制和压抑；第四，它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解放劳动力，使物质生产过程完全成为科学和技术在工艺上的运用，使人的劳动脱去沉重艰辛的外衣。

在这种性质的劳动中，人的劳动扬弃了限定在旧式分工基础上的局限性，作为既通晓多种文化知识，又懂得按照各种尺度进行生产的积极主体，活跃在各自的生产领域之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18 页）。或者说人不再把劳动的需要仅仅当作外在生存的必需，而是作为自身的内在驱动欲加以实现。人在劳动中感到的不再是辛劳和乏味，而是充满创造的乐趣。把克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本身当作人的一种追求、一种实现自我意图的努力，从根本意义上体现人的自由，真正超越受经济役使的择业观、劳动观。在这里，充裕的时间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创造能力奠定了基础。

毋庸置疑，人们关于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的对立，只有在真正认清了人的自由本性的时候，才能统一起来。

二、自由之境界

自人类诞生以来，自由便被视为神圣与崇高的象征，被认为是人的基

本生存价值之一，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类的发展史正是争取自由的奋斗史。作为自然人，为满足生存与生理的基本需要，人们渴望了解自然，寻求自由；作为社会人，为满足交往、成功、公平、尊重、安全等需要，人们乞求规范自身、获得自由。因此，自由不等于没有约束，更不等于放任自流。自由首先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前提，并建立在秩序、法规的基础之上；自由又以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为内涵，内嵌着价值与文化的时代指向。自由与野蛮、无知相对立，与崇高、博爱相伴随，与真、善、美紧相连。

自由的原则是积极性和创造性，自由的核心是智慧的发展。自由的价值根源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根源于从满足需要的可能性的角度对事物进行评价。创造是人类自由的主要形式。自由具有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是人的精神的产物。创造又是自由之首，理性和怀疑是自由之两翼。自由与责任又形同手足，责任是自由的基础，是对自由行为的规范，是自由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面。惟其如此，自由作为人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也就成了衡量一切文化、文明程度的标志和尺度。

人类需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赢得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彼岸世界只有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在彼岸世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拉开了自由王国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所以自由时间是获得个性解放的基本条件。

古往今来，凡人类文化繁荣之时，都是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裕的自由时间、良好的精神自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尼采、叔本华、歌德、丹纳以及中国的孔子等人的不朽作品，皆是他们在自由时间里自由思想的结晶。

然而，人们利用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决定了自由时间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自由不仅受个人自身内在价值的制约，体现为在个人价值选择下的自觉表白，而且受社会文化价值的萦绕，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这样，在不同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织网中，自由的感性定位通常极易被蜕化为世俗的消费享受或物欲的占有乐趣，并在感性文化（例如广告）的诱惑下无意识地丧失了自由的内在本质，丢弃

了自我的精神生活，从而使自由之崇高境界远离了本文的释义空间，引出无数的社会困惑。

在微观上，自由以个性化的实现为前提，是凭着“自由思想”去解读独立思想的实践，是包含着人类对自己所发现的真理的责任感，是条理分明的怀疑，是人类心灵的真正体验。在宏观上，自由以社会的进步为标志，以文明程度为目标，是人类进化中的一种自律性思维，是人类超越自身、实践人生的内在理想。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民族传统，五花八门的文化基础，无时不在共同构筑着自由的美丽图画，又无时不在辨读着自我本性的确切内涵。

历史的发展足以表明，对自由的追求没有物质基础不行，但是，光靠物质基础仍达不到自由之境界，还需要社会的净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金钱固然是为人服务的，现代人富裕千万倍，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比古代人也幸福千万倍。精神生活的充实既需要有超越物欲享受的文化修养和充满志趣、博爱的宏大胸怀，更需要明确自由探索的奋斗目标。所以，只有把个人的目标价值定位同社会发展及人类的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自由之精神境界。

三、自由本性的异化

消费主义的泛滥是近代工业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它的道德准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望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试图以物欲的满足和占有来构筑人们的社会、心理甚至精神的需求，把人们的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单一地定位在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来解读甚至炫耀生命之存在。消费主义的这种价值观无情地把人类追求自由时间与自由的真正本性推向了枯竭的边缘。

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消费无疑是刺激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刺激、诱导消费，并通过消费品的高速消耗、更新和废弃来寻找自我精神满足，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所追随的一种生活方式。当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广泛追随的一种时尚的时候，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消费社会。

进入消费社会的基本代价，一是把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淡化了各种

社会关系；二是高节奏的生活格调，丧失了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甚至把必要的体育锻炼也视为是一种浪费。鲍曼在他对基尔敏斯特和瓦科所做的访谈录中写到，消费主义是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消费的选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某种极为中心的角色，这与现代社会中通常由工作、职业、就业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可以说，消费主义主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上。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性物质进行操纵的行为。

所谓象征性物质，鲍曼认为，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等一些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尽管，消费社会只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他本身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但是，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动机、人的态度、人的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生存的总体逻辑作出基本判断和评价。

时下有一种带着普遍性的看法，以为消费主义为人的自由提供了保障，丰富了人的自由时间。然而，人类的真正悲哀和堕落也许正在于此。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具有的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给人提供一种普遍的幸福，甚至允诺人们都可以同样地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但却使消费者由于过分追求提高收入而陷入即使用金钱都难以挽回的新的精神“贫困”之中；其二，消费主义设立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但事实上，在这里自由被降格为消费主义，把自由时间等同于无度的消费，似乎人在消费中完成了自我实现。

尤其是在现实中，当琳琅满目的物品把大众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悠然自得”的自由状态，引向无穷无尽的“消费自由”的享乐之时，它在开了一条使现代社会的富人和穷人尽其可能地占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的道路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把人的自由纳入了“消费”制度体系之中。自由不再是需要精神付出的艰难行程，反而变成了由“消费”来加以组织的享受形式。这样，“自由”在现实中成为必须依赖“消费”才能得以存在的过程成为